DOI:10.13747/j.cnki.bdxyxb.2014.04.014

八十年代散文的时间叙事

颜水生

(贵州民族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 要:社会主义现代化是20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总体性思想,八十年代散文的时间叙事在意识形态叙述、历史批判精神、哲学探索意识等方面,都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性追求。首先,八十年代散文无论是对特定时间的隐喻与讴歌,还是厚今薄古意识,都是放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中进行考察。其次,八十年代散文的历史精神超越了十七年散文,十七年散文的历史精神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思维模式,八十年代散文的历史叙述是一个由事件填充的完整的时空体,八十年代散文的反思意识、比较意识和整体意识集中体现了历史批判精神。再次,八十年代散文虽然继承了十七年散文的经验方式,但在对时间的哲学思考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集中表现在对时间的本源追问以及对时间规律的思考。

关键词:八十年代文学;八十年代散文;十七年散文;意识形态;历史精神;哲学意识;时间形式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4)04-0080-06

20世纪中后期以降,西方学术界出现了"空间转向"的趋势,文学研究界也为"空间转向"的形成作出了一定贡献。进入21世纪以后,"空间研究"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尤其是"文学地理学"概念的兴起,更使文学的空间研究掀起了热潮。其实,时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时间的发展决定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广度与深度,通过人的生命活动、实践活动而赋予'时间'以价值和意义"[1]。然而,正如时间既习以为常又难以把握一样,文学中的时间形式一直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尤其是散文中的时间形式长期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实际上,散文中的时间形式比小说更为直观,也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本文以《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散文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和《八十年代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989年)为例,分析八十年代散文的时间形式,认为八十年代散文在意识形态叙述、历史批判精神和哲学思考意识等方面都表现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性追求。八十年代散文的时间叙事既继承了十七年散文的叙述经验,又超越了十七年散文的叙述精神,散文中的时间形式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表征,时间形式的不同体现了时代观念的变化。

一、意识形态与时间形式

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概念。大卫·麦克里兰考察了意识形态概念的演变历史后认为:"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是最难以把握的概念。"[2]1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导论》中开篇第一句话是,至今没有人能在意识形态的确切定义上达成一致[3],为了体现意识形态概念的多样性,伊格尔顿列举了16种意识形态概念。然而值得重视的是,"意识形态"概念的盛行与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尤其是最近几十年的意识形态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那些以某种方式把自己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人

收稿日期:2014-05-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50—70年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关联研究"(08BZW057)

作者简介:颜水生(1980-),男,湖南衡阳人,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们的保留地”[2]10。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使用了“意识形态”概念,但他并没有对“意识形态”概念作出系统的论述和确切的界定,恩格斯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建构了“意识形态的等级”体系,后来历经列宁、卢卡奇、阿尔都塞、葛兰西等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更是丰富多样。综合来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指的是与一定经济、政治相联系的思想观念的总和,意识形态是经济、政治的表现,是“社会的黏合剂”[2]44。从理论上说,文学创作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实践,意识形态叙述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叙述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在部分文学作品中,时间或者空间都体现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内涵。

特定时间的意识形态化是八十年代散文的重要特征。在十七年散文中,时间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化特征,其中以刘白羽的散文最为典型。八十年代散文继承了十七年散文的写法,对时间的叙述也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一方面,八十年代散文也习惯选择一些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内涵的时间作为叙述对象,如袁鹰的《十月长安街》,作者开头第一段话就表明特定时间节点的重要意义,“我们伟大祖国的千秋青史,将要以璀璨辉煌的金字,记下一九七六年十月”[4]110。“一九七六年十月”在散文中不再是一个普通的自然时间,而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意识形态时间,作者在叙述过程中,激情洋溢地抒发了对这个时间节点的看法,不仅讲述了这个时间节点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意义,也讲述了人民群众对这个时间节点的热烈歌颂。魏巍《在洪流中》也讲述了“一九七六年”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意义,文章开头第一句话表明了时间的意识形态内涵,“一九七六年一月,在那些被泪水打湿的日子,我就预感到一场革命风暴将要降临”[5]。这篇散文讲述人民群众在一九七六年的行动,其目的也就是为了表现意识形态内涵。另一方面,八十年代散文也习惯选择一些特定的时间节点作为意识形态的隐喻,从而使时间成为意识形态的象征,比如冰心《等待》、茹志娟《春颂》、端木蕻良《黎明的眼睛》等散文,这些文章中的“春”和“黎明”都有着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内涵,如在端木蕻良《黎明的眼睛》中,作者打开窗户之后,立刻感受到了春天的来临,作者借春天的来临,表达了对新时代的向往,作者在文章结尾情不自禁地抒发感情,“打开窗子吧!现在开窗子就不光是为了迎进阳光、空气,或者远眺青山的青、新柳的绿、燕子飞来的掠影,……而是迎接一个新的世纪”[6]。可以看出,意识形态是十七年散文和八十年代散文的共同内涵。

厚今薄古也是八十年代散文在意识形态叙述方面的重要特征。十七年散文尊崇历史进化论思想,认同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发展规律,对过去采取明显的批判态度,而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八十年代散文基本继承了十七年散文的时间叙述形式,为了凸显意识形态时间的重要性,八十年代散文突出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巨大变化,并对未来表达了美好的追求。如石英在《雨线串古今》中讲述了“昨天与今天”的巨大变化,并且认为“历史毕竟是在曲折地前进,新的已在无可比拟地胜过旧的”[7]。顾工在《吸引》中对时间的失去表达了惋惜,但对未来的吸引力表达了崇敬,他认为今天与过去有着巨大区别:“今天,我们的新一代,和两年前的新一代,他们的情趣,他们的目光,是有着多大的不同呵,多大的不同……”[8]不仅如此,顾工还认为今天可以重新获得过去失去的时间。洪洋《卷起千堆雪》对“今天”的重视为八十年代散文树立了典范,尤其是“旧日的长江令人留恋,明日的长江却更令向往”,明显表现了厚今薄古的意识,这种厚今薄古的意识又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内涵。作者讲述了大江合龙的时间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在方才这一瞬间,对现场施工的人来说,只不过是抛下了一块普通的石头;对长江来说,则是搬来了一座迫使它断流的大山。在施工纪录上,合龙只用了卅六小时二十二分;对历史来说,则跨过了无数个世纪。该用一行金字,把这一瞬间镌刻在人民的史书上。大江合龙的时间是:公元 1981 年 1 月 4 日 19 时 53 分”[9]。为了凸显这一特定时刻,一方面,作者把这一时间点放置在现代化历程中进行叙述,认为今天是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场面;另一方面,作者把“昨日的长江”与“合龙的长江”进行对比,突出了合龙时间在长江历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认为合龙时间是向“昨日长江”告别。

时间意识形态的隐喻与讴歌是八十年代散文的重要特征。抒情方式的选择是十七年散文和八十年代散文在意识形态叙述方面的重要区别，十七年散文在表现意识形态内涵时，大多会选择直抒胸臆的方式，然而八十年代散文在表现意识形态内涵时，较多地采取了隐喻方式，以一种相对含蓄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有时也会出现对时间的直接讴歌，隐喻与讴歌并行不悖，因此八十年代散文的抒情方式比十七年散文更为灵活多样。如方凌在《敢有歌吟动地哀》中，把时间的描述与环境描写紧密结合，以环境来隐喻时间的意识形态内涵，“一九七六年春，寒流象冷剑似地砭人肌骨。婀娜多姿的迎春花，不等她绽开金色的蓓蕾，就被冷酷的风雪打蔫了。三月下旬，还是白雪纷飞，天空总是阴沉沉的，使人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沉闷和压抑”[10]9。这段文字表面是在描述自然时间，但实际上是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的隐喻，作者紧接着在文章中就具体描述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又如《十月长安街》，虽然作者在文中无法抑制内心的真实情感，直接表现了对意识形态时间的看法，如“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九七六年的十月，英雄的十月，胜利的十月。我们迎来了天安门的朝晖，迎来了长安街上的锣鼓”[4]113。但作者在文章中也大量使用了隐喻的手法，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隐喻中国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发生的巨大变化。可以看出，八十年代散文无论是对特定时间的隐喻与讴歌，还是厚今薄古意识，都是放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中进行考察，因此，八十年代散文对时间的意识形态叙述表现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追求。

二、历史精神与时间形式

从理论上说，时间包括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历史是关于过去的范畴，是对过去的记录和阐释。然而，历史与时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奥斯本在《时间的政治》中对此有过追问：“历史是否是一个在时间上与众不同的领域，在性质上迥然不同于自然的时间性，以致它竟然能被单独总体化吗?抑或，它的时间性与自然的时间性轩轾不分?如果是这样，情况会怎么样呢?难道对时间而言，历史和自然就是所有的一切吗?”[11]奥斯本认为时间观念影响对历史的理解以及对待历史的态度。在文学创作中，时间与历史的关系也是十分复杂的，历史和自然不能涵括时间所有的一切，但它们都是文学的重要叙述对象；历史是时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以具体化的形式表现时间的总体性内容与特征，时间观念影响历史精神，历史精神是时间观念的表征。八十年代散文在历史精神方面超越了十七年散文，十七年散文中的历史精神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的思维模式，历史是今天和未来的垫脚石，历史与今天和未来有着明显的鸿沟，今天和未来是建构在否定历史的基础上。在八十年代散文中，历史与今天和未来不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历史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也不再是一个纯粹被否定的对象，而是时间的绵延：“它是活的，动的，而不是死的，它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这个流变过程挟带着过去的一切滚滚向前。”[12]八十年代散文中的历史是一个个由事件填充的完整的时空体，历史时空体所展现的反思意识、比较意识和整体意识体现了八十年代的时间观念——历史批判精神。

首先，八十年代散文具有自觉的历史反思意识。八十年代散文大多认同历史是由时间绵延而成，习惯于表现历史中的时间，或者把时间放置在历史过程中进行阐释，傅宁军《淹没在江涛中的书简》和范若丁《三月黄花》等作品集中体现了这种方式。在《淹没在江涛中的书简》中，作者在登临汲江楼时，看到浩淼的长江，他“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它那深邃的目光”，作者由此及彼，开始回顾镇江的历史，从白蛇传说到鸦片战争，作者把镇江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拷问与反思，并且得出了批判性结论，如结尾写到：“我不知为什么会想到那段不愉快的历史，我感到一种负重感，是因为这祖国母亲的脉管里也沉积着屈辱?它涛涛地向前去了，那涛声里也有失败者含悲饮泪的歌，在缓缓地回荡。就象一个母亲不能忘记生产时的阵痛一样，失败的耻辱，也是一个民族永远不能忘怀的。”[13]正是在这种反思精神的引导下，镇江的今天就不再是孤立的时间形式，而是积聚了深厚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时空体。

其次，历史比较意识。八十年代散文有着比较开阔的视野，它们把时间放置在历史链条中进行叙

述,时间的意义在比较视野中得到凸显,傅宁军《淹没在江涛中的书简》、范若丁《三月黄花》等散文运用了这种方法。范若丁《三月黄花》体现了明显的时间意识,作者对“三月”不仅有直白的叙述,而且有深刻的隐喻,在作品中,“三月”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时间范畴,也是一个蕴含了丰富意识形态内容的主观形式。与此相似的是,作品中的“黄花岗”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空间范畴,也是一个具有深厚意识形态内涵的主观形式,作者在这样的时间和空间观念中,把“三月”与“黄花岗”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时空体。即使如此,“三月的黄花岗”也不是一个封闭的时空体,而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时空体,作者把“黄花岗”放置在历史长河中进行叙述,在比较视野中凸显“黄花岗”的意识形态价值。作者在回顾了黄花岗的历史后,表达了对黄花岗的礼赞,认为“历史长河中,往往出现漩涡”,强调“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的公正与无情”[14]95-96。尤其是文章写到:“七十二烈士都是平凡的人,他们生不求封侯,死无意立碑坊,当然无掘墓鞭尸的后顾之忧。反之,有些帝王后妃的陵寝,虽然固若金汤,总不免掘墓平陵的厄运。暴戾恣睢的慈禧太后,最后落得个被发棺的下场,即为一例。企图威慑后世者,被发棺;根本不虑葬身之地的七十二烈士,却在人们心头竖起了永恒的丰碑。”[14]96作者把黄花岗烈士与封建帝王后妃进行对比,在历史比较中突出了黄花岗烈士的价值和意义。

再次,历史整体意识是八十年代散文的重要特征。正是在历史整体意识的支配和指导下,八十年代散文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时空体,与此相似的是,八十年代散文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完整的时空体——“文革”,可以说,反思“文革”集中了八十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巴金《怀念萧珊》、丁玲《“牛棚”小品》、杨绛《干校六记》、荒煤《阿诗玛,你在哪里?》等散文鲜明表现了这种历史整体意识。在这些散文作品中,“文革”被叙述成为“梦魇一般的日子”、“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着血和泪的日子啊”[15]、“乌云压城,万马齐喑,天地为愁,草木呜咽”[10]10。作者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记录“文革”的真实历史,字里行间满蕴着悲伤与痛苦,在情感的抒发中又透露着深刻的历史批判精神。在这些散文中,“文革”是一个由无数历史事件组成的历史整体,一方面,作者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表达对历史整体的深刻反思,另一方面,作者通过对历史整体的直接发言而实现对历史的深刻批判,反思与批判是他们对“文革”的共同态度。

可以看出,八十年代散文的历史批判精神,无论是对古代史,还是对革命史,尤其是对“文革”的反思,都是为了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张扬八十年代的新启蒙精神,从而为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开辟道路,最终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三、哲学意识与时间形式

一般来说,时间虽是习以为常的,但又是难以把握的,因此对时间的思考也并非轻而易举,奥古斯丁对此深有体会:“时间究竟是什么?谁能轻易概括地说明它?谁对此有明确的概念,能用言语表达出来?可是在谈话之中,有什么比时间更常见,更熟悉呢?我们谈到时间,当然了解,听别人谈到时间,我们也会领会。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16]吴国盛在《时间的观念》中认为,对时间的思考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哲学思考就是其中之一,所谓时间的哲学思考,不是分析时间的定义与概念,也不是从经验角度分析时间的价值与意义,而是追寻时间的本源与规律。十七年散文对时间的叙述大多是经验方式,很少触及到对时间的本质思考,八十年代散文虽然继承了十七年散文的经验方式,但也超越了十七年散文纯粹的意识形态域限,在对时间的哲学思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首先,时间的本源追问。正如奥古斯丁对时间的困惑一样,楼肇明《大地书页》对时间的本源进行了追问,成为八十年代散文对时间进行哲学思考的典型代表,“时间始终是我一个猜不破的谜,没有年代的基本框架,上下竟是一片模糊,只有循环往复的季节和晨昏,装点季节晨昏的风霜雨露……”[17]116作者对时间进行了追问,表达了自己的疑惑心理,他对时间的描述虽带有明显的经验形式,但是作者

把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结合起来思考，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时间不受空间支配，它在空间和空间之外流来流去，在两个空间之间形成回流；在大大小小的空间和空间分割的版图里，有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支流，数不清的交叉小径的迷宫。时间是通人性的和逆人情的，它时而急驶，时而漫步，匀速和不匀速，稠密和稀疏，只因别有一番喜怒哀乐，兴衰荣辱，是故它时而颓丧，时而喜悦，时而慷慨大度，时而吝啬残酷。无始无终的是心态时间，有始有终的是物态时间”[16]117。这一段话至少在三个方面体现了哲学思考，其一，作者明确了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他认为时间受空间包围，但不受空间支配，他既看到了时间的空间化形式，又指出了时间的独特性，时间的流动性是区别于空间的重要特征。其二，作者把时间与人的存在紧密相连，他认为时间是人性与逆人情的统一，其实是强调时间规律的重要性，提醒人们应该遵行时间规律，在作者看来，遵行时间规律，时间就是通人性的，违反时间规律，时间就是逆人情的，时间就会施加惩罚。其三，作者把时间区分为物态时间和心态时间，与哲学思考中的客观时间与主观时间的区分是一致的。从理论上来说，客观时间与主观时间其实都是一种时间，只是认识和思考时间的方式不同，物态时间是以客观的方式认识时间，正如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时间概念，心态时间是以主观的方式认识时间，是人类的生命体验。

其次，探讨时间规律。时间的流逝是自然规律，是不可逆转的，八十年代散文对时间的规律的认识体现出一定的哲理性，郁风《冬日抒情》借用名言对时间的自然规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句名诗几十年来不断被人引用，无非是象征着希望。然而，自然的规律，时间的循序是必然的，人间的规律虽也有必然性，却可迟可早。在这透明的冬天里，人们可以用清醒的头脑，认清脚下的路，但还得一步一步地走，躺着不动或再走弯路，都会推迟希望的实现。”[18]郁风从时间的自然规律出发，探讨人类社会的规律，指出时间规律与人间规律的区别，认为只有遵行时间的自然规律，才能促进希望的实现。八十年代散文对时间规律的表现有三个重要特征，其一，八十年代散文讲述了时间的无情，稍纵即逝，不可挽回，郭保林《写给故乡的黄昏》对时间的流逝表达了惋惜情绪，“从黄昏到黎明，从黎明到黄昏。生活的脚步总是匆匆的，转眼间十多个春秋过去了”[19]。又如岑桑《残雪断想》对时间的无情有着深刻的体会：“时间无情，却也深情，它让该死的死，该生的生；让该诅咒的归于毁灭，该赞美的郁郁葱葱。”[20]439其二，八十年代散文特别重视“春天”。一方面，八十年代散文特别重视“春天”的奉献精神，认为“春天”是四季转换的枢纽，春天是四季的开始，无私地给夏天奉献了所有的一切，推动了四季的转换。茹志娟在《春颂》中，讲述了对春的认识过程，“春为一年之首，除了命运的安排，实在也只有她堪称一年之首，不愧为一年之首，人们爱她，原因也在这里。她快快活活地把自己斗争得来的伟业过渡给夏。当然，有时也难免有点缠绵，给人间落下一点贵如油的春雨，及时地把暖和过来的世界交给了夏”[21]。另一方面，八十年代散文特别重视“春天”的意识形态价值，经常把“春天”与时代紧密相接，经常把“春天”作为时代的象征，如岑桑《残雪断想》写到：“久违了，春天，你这生机萌发的美妙时节！今天我们贴起春联，挂起灯笼，架起高矗的彩楼，点起不眠的灯火；孩子们还烧起他们的爆竹和烟花，姑娘们还戴起她们的蝴蝶结，穿起她们的花衣裳，高高兴兴，衷心把你欢迎。呵呵，春天，唱不尽的大好时光！比起我们对你如此激动的情怀，这一切加起来又算得上什么？”[20]439其三，八十年代散文对“明天”充满美好的向往和追求，一方面，八十年代散文赋予了“明天”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如穗子《落日》，作者在观看日落以后，对时间发出了感慨：“落日之后，又将孕育新的一天——明天，明天是光和热，是希望，是理想和未来。”[22]又如徐开垒《幽林里的琴声》写到：“风霜雨雪之后，有了晴和的春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有光明灿烂的明天。”[23]上述两篇作品中的“光和热”、“希望”、“理想和未来”、“光明灿烂”等词语充分体现了“明天”的意识形态价值。另一方面，八十年代散文对“明天”表达了真挚的热爱，如陆棨《会说话的口弦》写到：“我爱美好的明天啊！”[24]可以看出，八十年代散文对时间规律的思索，尤其是对“春天”和“明天”的向往，象征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美好未来的追求。

参考文献:

[1]程慧敏,李和平.马克思时间理论的内涵及其意义[J].理论学刊,2011(8):8-10.
[2]大　卫.意识形态[M].孙兆政,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3]Terry Eagleton. Ideology:an Introduction[M]. London·Newyork:Verso,1991:1.
[4]袁　鹰.十月长安街[M]//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散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5]魏　巍.在洪流中[M]//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散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4.
[6]端木蕻良.黎明的眼睛[M]//八十年代散文选:1981.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24.
[7]石　英.雨线串古今[M]//八十年代散文选:1983.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143.
[8]顾　工.吸引[M]//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散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235.
[9]洪　洋.卷起千堆雪[M]//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散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298.
[10]方　凌.敢有歌吟动地哀[M]//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散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11]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M].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5.
[12]吴国盛.时间的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7-188.
[13]傅宁军.淹没在江涛中的书简[M]//八十年代散文选:1984.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20-21.
[14]范若丁.三月黄花[M]//八十年代散文选:1984.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15]巴　金.怀念萧珊[M]//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散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31.
[16]奥古斯丁.忏悔录[M].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42.
[17]楼肇明.大地书页[M]//八十年代散文选:1988.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18]郁　风.冬日抒情[M]//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散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449.
[19]郭保林.写给故乡的黄昏[M]//八十年代散文选:1986.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60.
[20]岑　桑.残雪断想[M]//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散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21]茹志娟.春颂[M]//八十年代散文选:1981.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24.
[22]穗　子.落日[M]//八十年代散文选:1984.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110.
[23]徐开垒.幽林里的琴声[M]//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散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251.
[24]陆　棨.会说话的口弦[M]//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散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255.

On the Time Narrative of the Prose in Eighty Years

Yan Shuishe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Chinese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as the totality idea of the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movement in eighty years, because the time narrative of the prose in eighty years which included the ideological narrative, the spirit of historical criticism, the philosophy consciousness etc, were on the totality pursuit of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Firstly, the prose in eighty years which both metaphoring or extolling the specific time, and hav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which laid more stress on the present than on the past, was placed o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Secondly, the history spirit of the prose in eighty years were beyond seventeen years, because the history spirit of the prose in seventeen years were clearly demonstrated with binary oppositional thinking model, the history narrative of the prose in eighty years was an full time-space which was filled with some events, and the reflective consciousness, comparative consciousness and integ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se in eighty years was collectly demonstrated with the spirit of historical criticism. Thirdly, although the prose in eighty years inherited from the mode of experience of the prose in seventeen years, it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bout time, which was clearly demonstrated with the original question on time and thought about the time law.

Key words: literature in eighty years; prose in eighty years; literature in seventeen years; ideology; historical spirit; philosophical consciousness; time shapes

(责任编辑　王　作)